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入选期刊



中国诗歌研究

第 7 辑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华书局

中国诗歌研究

第七辑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 第7辑/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赵敏俐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

ISBN 978 - 7 - 101 - 07766 - 7

I. 中… II. ①教…②首…③赵… III. 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丛刊 IV. I207. 22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2741 号

-
- 书 名 中国诗歌研究(第七辑)
主 办 者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 编 赵敏俐
责任编辑 马 婧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 zhbc. com. cn](http://www.zhbc.com.cn)
E - mail: zhbc@ zhbc. com. 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1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66 - 7
定 价 48.00 元
-

目 录

·《中国诗歌通史》专栏·

汉代五言诗起源发展问题再讨论	赵敏俐(1)
刘基诗歌体貌述论	左东岭(29)
康熙朝的神韵诗派	王小舒(47)

· 诗歌理论研究 ·

于以表情,爰著斯诗

——“魏晋文学自觉说”与“抒情传统说”平议

王 南(56)

论元和诗人的诗体意识

——以白居易与韩愈为中心

张学君(69)

清初遗民诗的群体特征

李 瑄(77)

· 诗歌文体研究 ·

中晚唐“开教坊”与曲子词的繁荣

曹胜高(91)

清人注杜的推释法

杨永发 郭芹纳(123)

论《少年中国》的形式诗学

——以新诗“发生”为背景的考察

张桃洲(132)

· 诗歌文献与诗人史迹研究 ·

陆经事迹诗文钩沉

王福利(146)

王遂年谱

王可喜(160)

· 青年论坛 ·

论孔子之前《鲁颂》不是《诗三百》的组成部分

吕华亮(182)

《诗经·关雎》比兴辨正

徐明英 熊红菊(189)

论《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的编次

——从“相和歌辞”总类解题的标点谈起	李 贻(197)
于慎行诗论	范知欧(212)
竟陵论唐人七律	
——以《唐诗归》为中心	岳 进(227)
从翻译到创作:余光中对狄金森诗歌的接受	胡秋冉(237)

·《中国诗歌通史》专栏·

汉代五言诗起源发展问题再讨论

赵敏俐

【内容提要】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公案。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之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文认为:从现存文献来看,早期比较完整的五言诗都是出自歌诗或者乐府,也与时代语言的发展变化有关,因此不能把五言这一诗体的起源简单地归之于民间歌谣。同样,文人五言诗的起源与发展也当与汉代的乐府歌诗发展进程相一致。所以,在枚乘时代不可能产生像《古诗十九首》那样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起码要等到西汉中期以后。但是,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汉代文人五言诗也不会迟到东汉末年才产生,而应该产生于东汉早中期。班固的《咏史诗》的出现,就是汉代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所反映的享乐内容与和平之气,也说明它当是汉代社会繁盛期的产物,而决不会产生于东汉末年士风激荡的年代。

【关键词】 汉代 文人五言诗 《古诗十九首》 《咏史诗》起源与发展

五言诗是汉代主要的诗歌体裁,也是中国中古诗歌最流行的诗歌形式。关于五言诗的起源发展问题,也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这里面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作为五言诗体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第二是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其中关于五言诗体的起源发展问题,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关于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发展,特别是关于“枚乘杂诗”、“苏李诗”的作者真伪问题和《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代问题,至今仍然争辩不休。这二者之间又互相关联,不可分割。治汉代诗歌史者,对这一问题不可回避。此文的目的,就

是要在前人争论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一学术上的总结,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五言诗的起源

要对汉代五言诗问题详加讨论,首先我们必须对它的起源问题有一个概要了解。对此,前人已经多有论述。如晋人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

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两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①

梁人刘勰亦云: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②

以上两段文字,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探讨五言诗起源问题的论述,其结论也多为后世学者所采纳。的确,如果我们考察五言诗的起源,最早是要从《诗经》说起。其实,《诗经》中的五言诗句,远不止于如挚虞、刘勰所举的《召南·行露》一诗中才有,《卫风·木瓜》里也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这样的五言诗句。不仅《国风》中存在着个别五言句,就是产生时代比较早的《周颂》与《商颂》,也不乏此类句式。如“骏奔走在庙”(《周颂·清庙》),“骏惠我文王”(《周颂·维天命》)。“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颂·玄鸟》),“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帝立子生商”(《商颂·长发》)。在《小雅·北山》一诗的四、五、六章中,竟有连续十二个五言诗句出现:“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大雅·豳》之卒章也连续用了六个五言诗句:“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的《商颂》原为殷商时期的作品,《大雅·豳》一般都认为是西周早期之作,此时的诗歌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整齐的五言诗句,这说明,在《诗经》中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一首完整的五言诗篇,但是它的确是后世五言诗产生的渊藪。既然在《小雅·北山》和《大雅·豳》里面已经有了连续六个甚至更多的五言诗句的使用,我们甚至很难排除那时或者有产生比较简单的完整五言诗的可能性。例如,在《国语·晋语二》中曾记录了晋献公时优施的《暇豫歌》一首:“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这首诗共四句,其中已有三句是五言,具备了五言诗的雏型。它的创作时间属春秋前期,和《诗经·国风》中的一些诗

篇创作大体上是同时的,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至春秋末年又出现了一首五言的《野人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豮。”(《左传》定公十四年引)这首诗虽然仅有两句,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已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简单的五言诗。在战国时代,《孟子·离娄》篇曾引用了一首《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首诗中除了第二句和第四句末尾有两个语气辞“兮”字之外,也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在《楚辞·渔父》中也有记载:“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除了“我”字写成了“吾”字,其它完全一样。据《孟子》书中所言,这首诗是“孺子”所歌,而《楚辞·渔父》则说是渔父所唱。可见,这首歌在战国时期已经流传很广。这说明,到战国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产生完整五言诗的可能。另一个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是秦始皇时曾流传过一首《长城歌》:“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③这不但是一首非常完整的五言诗,而且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汉代是五言诗得到全面发展的时期。早从汉初起,五言歌诗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诗体。传为虞美人所做的《和项王歌》,最早见于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引自汉初陆贾《楚汉春秋》,因而颇受后人质疑。但是我们如果从五言诗在先秦和汉初发展的情况来看,虞美人做出这样的五言歌诗并非没有可能。因为略早于此的秦始皇时的《长城歌》已经是完整的五言,与虞美人同时的汉高祖戚夫人,有《春歌》传世:“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此诗除前两句之外,后面都是五言,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较完整的五言形式。我们注意到,这种与之相类似的五言形式,早在汉初的散文著作中就有更多的例子。如陆贾《新语·术事》:“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事不易法,古今同纪纲。”《淮南子·汜论训》:“孔子辞廩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④至李延年创作《北方有佳人》,更是一首完整成熟的五言新体:“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此诗第五句中虽然多出了“宁不知”三字,但是正如逯钦立所言,“当系歌者临时所加之衬字……无害此歌之体格音节”。^⑤李延年本为汉武帝时代著名的音乐家,史称其“好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汉书·外戚传》)。据说此诗的演唱曾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李延年也因此而贵幸。值得注意的是,产生于这一时期有《东光》一诗,也基本上以五言为主:“东光乎? 仓梧何不平? 仓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此诗除第一句之外,其余皆为五言。诗以生动的语言,描写了汉武帝元鼎五年出征南越的将士的悲怨之情。^⑥《东光》一诗在《宋书·乐志》中被列入相和曲,相和这一形式在西汉时也属于新兴起的歌诗艺术。与此约略同时的还有相和曲的《江南》一诗,也当产生于此时。^⑦这说明,五言诗这种形式,在汉武帝时代的各种新声曲中

已经比较流行。至于汉成帝时班婕妤的《怨歌行》，则代表了这一时代五言歌诗的最高水平：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载《文选》卷二十七，列在魏武帝乐府之前。考《文选》的编纂体例，在同类诗作中，基本上按时代前后排列，可见萧统将此诗认定为班婕妤之作无疑。李善注：“《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后赵飞燕宠盛，婕妤失宠，希复进见。成帝崩，婕妤充园陵。薨。”这首诗在《玉台新咏》中又题为《怨诗》。关于这首诗的真伪，历来多有争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可见这首诗是否为班婕妤所作，在六朝时期就已经有争论了。今人多持怀疑态度。陆机《班婕妤》：“婕妤去辞宠，淹留终不见。寄情在玉阶，托意唯团扇。”傅玄《怨歌行·朝时篇》：“自伤命不遇，良辰永乖别。已尔可奈何，譬如纨素裂。”陆机和傅玄同为西晋人，距汉不远，他们在诗歌中吟咏班婕妤并不约而同地提到团扇的典故，显然认为这首诗是班婕妤所做。更何况，此诗以团扇为喻，巧妙地表达了一个宫中女子担忧自己的命运以及唯恐被弃的复杂心情，既切合班婕妤的身世，也符合她的性格。像这样感情丰富而又文采斐然的作品，如果没有身处其中的切身感受和很高的艺术修养，一个“高等伶人”是不可能写出来的。^⑧既然早在西汉早年的戚夫人已经可以歌唱整齐的五言，汉武帝时代已经产生了《北方有佳人》和《东光》这样的诗作，班婕妤作为一代才女，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也是理所当然的。

五言诗的起源与发展，不但经历了一个由“杂在四言之间”到“半章”再到“全曲”的过程，而且也是诗体形式不断探索的过程，是汉民族语言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诗是有节奏有韵的语言的加强形式，从这一点来讲，五言诗与四言诗之所以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五言比四言多出一个字，还因为二者表现为不同的节奏韵律。四言基本上是二分节奏，五言则可以视为三分节奏。其典型句式是“二二一”或者“二一二”。由此我们发现，五言诗的句法节奏，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一二二”式为主转为“二二一”或者“二一二”为主的过程。《诗经》中的五言句式，从节奏上看很不规范，如有的是“一四”式，如《商颂·玄鸟》“正/域彼四方”、“外/大国是疆”。有的是一二二式，如《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有的虽然可以分割成“二二一”或者“二一二”式的节奏，但是却需要有虚词的连缀，如《邶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娶妻如之何”。《暇豫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渔父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很明显地表现为这种句法结构的过渡形态，前两句中尚有虚词相连缀的现象，后两句则完全符合后世的五言结构。这种句法结构的变化，在战国后期的散文著作里也可以看出。如《战国策·赵策》：“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战国策·秦策三》：“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虽然符合五言的三分节奏，但是虚词在这里却起着重要句法关联作用。而下一类句式，如《晏子春秋》卷七：“文绣/被/台榭，菽粟/食/鳧雁。”《战国策·齐策》：“骏马/养/外厩，美人/充/下陈。”则不但在节奏上，而且在语言结构上都完全符合五言诗的标准了。这说明，作为一种诗体形式的五言，是经过先秦时代的长期演化才基本成型的。^⑨

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五言诗起源于民间歌谣。如有的人认为虞美人的《和项王歌》、班婕妤的《怨诗》等都是后人伪托，而戚夫人的《春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铙歌》中的《上陵》等又不是“纯粹的五言”，所以，只有汉成帝时的《黄爵谣》（邪径败良田）和《长安为尹赏歌》“为五言之祖”，^⑩此说虽然由于过于强调五言诗的“纯粹”性，勇于疑古且割断了其与前代一些五言诗歌的关系而被人们纠正，但“五言诗起源于民间”则成为权威性的说法而被广泛采纳，如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说：“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它诗歌形式一样，都是从民间产生的。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远在四言诗盛行时代，五言诗即已萌芽。……自汉武帝以后，这种形式的五言歌谣，大量地被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它们有不少的新颖故事，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注意和爱好。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试行模仿起来，于是就有了文人五言诗。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⑪

表面看起来这种说法颇为周密，也能够很好地将现存的五言诗连缀成一个链条。但仔细考察我们却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五言诗的发展实际。

首先从时间上看，现存最早的五言诗句，出现在《诗经》的《商颂·玄鸟》、《大雅·烝》两诗当中，这两首诗的创作年代分别在商代和周初，一般认为比《召南·行露》的产生时间要早，但是二者都不能称之为民间歌谣。再往后看，《国语·晋语二》中记录的晋献公优施的《暇豫歌》，也不属于民间歌唱。在现存汉代诗歌中，最早具有五言诗体形式的汉初戚夫人的《春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也不是民间歌谣。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五言诗这一形式最初并不是只发生在民间，只在民间歌谣当中流行，只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才逐渐被文人注意、爱好和模仿，实际上它从初始到完善的全过程中都应该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参与。

其次是这种说法过于强调了“民间”与“文人”的对立性。考察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

究,“民间”是个被学界最为推重的词汇,但何谓“民间”,并没有人从理论上对它进行界定,大致来讲,凡是在历史文献中那些无名氏的“歌”、“谣”类作品,往往都被称之为“民间歌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在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所谓“民间歌谣”,其作者的身份是值得讨论的。如《孟子》里所记载的《孺子歌》,按字面意理解,“孺子”就是儿童。这首歌是否为儿童所作,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其歌辞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非一个儿童所能说出。这首歌在《楚辞》中被说成是“渔父”所唱,这个“渔父”也未必是一个地道的渔民,很可能是一位避世的“隐士”。^⑫事实上,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那些所谓的民间“歌”、“谣”,很可能就是在野的文人所做,现存汉乐府中的许多歌诗,也出自无名的文人之手。“民间”和“文人”本是两个互相包容的群体,在五言诗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五言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形式,早在《诗经》时代已经萌芽,到战国末期已经有完整的五言全篇出现,西汉时代是五言诗体的正式完成期,从西汉初年戚夫人的《春歌》到汉武帝时代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再到西汉后期乐府、歌谣等五言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五言这一新诗体已经基本成熟。

二、关于文人五言诗产生时代的讨论

在汉代五言诗起源与发展问题上,最大的公案是文人五言诗的真伪与产生时代问题。汉代文人五言诗,通常指的是在汉乐府之外的由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包括在《文选》中所辑录的《古诗十九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玉台新咏》所录《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四座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四首,^⑬《枚乘杂诗》中的《兰若生春阳》一首,^⑭《古文苑》所收《李陵录别诗》八首,散见于其它典籍中的《橘柚垂华实》、《步出城东门》、《新树兰蕙葩》三首。^⑮还有班固的《咏史诗》、秦嘉的五言《赠妇诗》三首、邴炎的《见志诗》、赵壹《刺世疾邪赋》所系《秦客诗》与《鲁生歌》等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作。这些诗篇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其高超的艺术成就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这些诗篇大多没有留下作者名字,且后世记载多有矛盾,因而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间问题,作者问题,艺术特征等问题,至今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同时也缺乏从汉代诗歌整体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观照。

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与发展问题,早自六朝时起就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而这种争论,又主要集中在传为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的诗上。关于班婕妤的诗,我们在上面已经有过考辨,下面我们分别介绍有关枚乘、李陵、苏武等人五言诗的相关讨论。

先说关于“枚乘杂诗”和“古诗十九首”。“枚乘杂诗”之说,最早见于梁陈之际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其中辑录《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兰若生春阳》、《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等九首,署名为“枚乘杂诗”。但是早于它编成的《文选》,虽然辑录了这九首中的八首(《兰若生春阳》一首《文选》未录),并与另外十一首合成一组,而名之曰“古诗十九首”,并没有提到枚乘的名字。与《文选》同时稍晚一些成书的《诗品》,专列“古诗”一目,并说:“其体源出於《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按钟嵘在《诗品》中所提到的这些古诗,包括“陆机所拟十四首”和《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均见于《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当中。现将三书所提到的诗篇列表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篇目名称	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	青青陵上柏	今日良宴会	西北有高楼	涉江采芙蓉	明月皎夜光	冉冉孤生竹	庭中有奇树	迢迢牵牛星	回车驾言迈
文选所收	√	√	√	√	√	√	√	√	√	√	√
诗品记录	陆机拟	陆机拟	陆机拟	陆机拟	陆机拟	陆机拟	陆机拟		陆机拟	陆机拟	
玉台题名	枚乘杂诗	枚乘杂诗			枚乘杂诗	枚乘杂诗			枚乘杂诗	枚乘杂诗	

(接下表)

(续上表)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篇目名称	东城高且长	驱车上东门	去者日以疏	生年不满百	凛凛岁云暮	孟冬寒气至	客从远方来	明月何皎皎	兰若生春阳	橘柚垂华实
文选所收	√	√	√	√	√	√	√	√		
诗品记录	陆机拟		√				√	陆机拟	陆机拟	√
玉台题名	枚乘杂诗							枚乘杂诗	枚乘杂诗	
备注	按《诗品》云陆机所拟十四首,今《陆机集》存有十二首,其中十一首见于《古诗十九首》,另有一首为《拟东城一何高》,疑为拟十九首中《东城高且长》。									

据上表所知,现存文献中最早辑录这些古诗的当为《文选》,它选录的十九首作品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固定的名称“古诗十九首”。其次是钟嵘的《诗品》,它也专列古诗一目,并且特别推重其中陆机模拟过的十四首作品,认为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此外它还提到了以《去者日以疏》为代表的四十五首作品,认为这些作品“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最后他又提到了《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两首,说它们“亦为惊绝矣”。而关于“枚乘杂诗”之说,虽然只见于三本书当中最晚出的徐陵《玉台新咏》,可是关于枚乘作过五言诗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可见关于这些诗歌的作者,在当时就已经有“枚乘说”、“傅毅说”、“建安中曹王所制说”,但是都没有得到当时人的普遍认可。所以,无论是萧统、刘勰还是钟嵘,最后都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萧统在《文选》里把它编在李陵与苏武诗之前,从此书的编辑体例来看,萧统认为这些诗属于汉代的作品,应无疑义。刘勰则笼统地说它们是“两汉之作也”,不过却特别提出其中《孤竹》一篇为傅毅的作品。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而非衰周之倡也。”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玉台》所录的“枚乘杂

诗”还是陆机所拟的十二首,除《兰若生春阳》一首之外,其余都在《古诗十九首》当中。由此可见,“古诗”一词,在六朝时期已经是一个具有特殊内涵的概念,专指那些产生于汉代的无名氏的五言诗作品。

关于“苏李诗”的说法也存在着问题。在现存文献中,最早署名李陵与苏武的诗是《文选》中所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和“苏子卿诗四首”。萧统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指的就是《文选》中署名李陵的《携手上河梁》一诗。钟嵘对李陵诗也表示肯定。他在《诗品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不仅如此,钟嵘还据此把李陵列为自汉以来写作五言诗的上品诗人。^⑥梁人任昉在《文章缘起》中也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不过,在六朝时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李陵诗”之说,早在刘宋时代的颜延之就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⑦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疑于后代也。”这说明,关于枚乘、李陵、苏武等人是否做过五言诗,包括《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于何时等问题,在六朝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历史遗案。

不过,虽然自六朝以来关于枚乘、李陵、苏武诗都有疑问,可是人们对于这些诗篇还是基本上抱着肯定的态度来学习和认识。如李善在给《文选》中《古诗十九首》作注时就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⑧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在这里所引用的“驱马上东门”与“游戏宛与洛”两句,恰恰不包含在《玉台新咏》题名为“枚乘杂诗”的八篇诗歌里面。这说明,李善虽然也对枚乘五言诗有所怀疑,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枚乘有写作五言诗的可能,而只是说《古诗十九首》里面不全是枚乘作的,还可能有东汉人的作品,如《驱马(车)上东门》、《青青陵上柏》(游戏宛与洛)。

最早对所谓的枚乘诗、李陵诗、苏武诗表示怀疑的,当为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说下》:“《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采,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⑨此后渐有人持此说。如苏轼《东坡诗话补遗》:“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苏轼在《答刘沔书》中又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而统不悟。”按苏东坡这里所说的“‘江汉’之语”,指的是苏武诗“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苏轼从诗中所写的地理不符为由而否定此诗为苏武所作,从分析诗歌内容的角度来讲是正确的。但是从诗歌写作的角度来看却不一定合适,因为无论古今作诗,往往都会用到大量的借代、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所

以苏轼光从这一点还不能得出苏武的诗一定就是“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结论。不过,苏轼此说却引发了其他人对这些诗篇的进一步怀疑,如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十四中曾指出李陵诗中“盈”字犯汉惠帝讳,所以不能是西汉时作。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张扬其说。再如清人朱彝尊《玉台新咏跋》认为《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一诗中有四句与乐府诗《西门行》相同,由此认为《生年不满百》一诗可能是“文选楼”诸学士裁剪乐府诗而成,等等。^②

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关于枚乘杂诗、李陵诗、苏武诗真伪问题的讨论逐渐进入一个高潮。其中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是梁启超。他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继承苏轼等前人的观点之外,还将有关的证据与进化论相结合,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考证理论。他说:

凡辨别古人作品之真伪及其年代,有两种方法,一曰考证的;二曰直觉的。考证的者,将该作品本身和周围之实质的资料搜集齐备,看它字句间有无可疑之点。他的来历出处如何?前人对于他的观察如何?……等等,参伍错综而下判断。直觉的者,专从作品本身字法、句法、章法之体裁结构及其神韵气息上观察,拿来和同时代确实的作品比较,推定其是否产生于此时代。……我们用历史家的眼光忠实观察,以为西汉景武之间未必能够发生这种诗风这种诗体;倘使已经发生,便当继续盛行,又不应中断二三百,到建安黄初间始再振其绪。所以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代这个问题,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仔细研究,要下一个极大胆的结论曰:五言诗起于东汉中东叶,和建安七子时代相隔不远,——“行行重行行”等九首决非枚乘作,“皑如山上雪”决非卓文君所作;“骨肉缘枝叶”、“良时不再至”等七首决非苏武、李陵作。^③

根据上面的原则,梁启超又综合了以下几点,首先对《古诗十九首》的写作时代作了新的推断:第一,“古诗十九首”风格相近,应为一个时代的东西,前后不会相差几十年,断不会西汉初人有几首,东汉初人有几首,东汉末人又有几首。第二,根据李善和洪迈等人的观点,这些诗中有的犯了西汉人的避讳,有的写了东汉时代的名物。第三,再参以刘勰定“冉冉孤生竹”为傅毅作之语,并和班固《咏史诗》相较,则东汉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由此他估定《古诗十九首》的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〇至一七〇约五十年间”。复次,梁启超又对《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作了一番研究,认为其“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依前文推论,《十九首》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代了”。^④梁启超接着又通过以下几点李陵、苏武诗作了推断。第一、从时代风格来看,汉武帝时代决无此种诗体。第二、赠答诗起于建安七子,两汉词翰,除秦嘉《赠妇》外更无第二首,然时已属汉末。第三、《汉书·苏武传》中录有一首李陵歌,与

传说李陵五言诗相距甚远。所以这些诗决不是李陵、苏武所作。但是也不是后人有意作伪。“大概总是建安七子那班人。而各首又非成于一人之手,各诗气格朴茂淡远,决非晋宋以后人手笔,而桓灵以前,又像不会有替人捉刀的风气,建安七子既创开赠答之风,自然容易联想替古人赠答,他们又喜欢共拈一题,数人比赛着做,各人分拟,所以拟出的共有几首之多,各首语义多相重复,而诗的好坏亦大相悬绝”^{②3}。除梁启超之外,否定枚乘、李陵、苏武诗的学者,在当时还有徐中舒、张为骥、罗根泽、陆侃如、冯沅君、逯钦立以及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等人。^{②4}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自唐人刘知几开始到今人梁启超等提出的否定枚乘诗、李陵诗、苏武诗的诸多看法举证并不坚实,有的还属于误解。如关于汉人避讳之说与李陵在长安送别而诗中不该提到“江汉”一语的问题,前人已经有过系统的反证。其它如所谓枚乘、李陵、苏武诗不见于《史记》、《汉书》记载,苏武诗“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与苏李二人当时情事不合等等,都是推测之辞。近人黄侃、古直、隋树森、日本学者朱偰、当代台湾学者方祖燊、大陆学者雷书田、张启成、章培恒等人分别撰文,进行了详细反驳。^{②5}

平心而论,这次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真伪和产生时代等问题的大讨论,虽然争辩双方都提出了许多论点,并且在广泛搜罗古代典籍证据方面各自尽了最大努力,由此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②6}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特别是找不到汉代有关这一问题的直接记载,所以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可是,由于受现代疑古思潮的影响,这次讨论最终还是否定派占了上风。特别是梁启超的观点,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建国前后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大都采纳了他的观点,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社科院文研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新探》等著作,都不承认西汉时代已经有水平较高的文人之作。而且,他们以班固的《咏史诗》为例,认为汉代文人五言诗到班固的时代尚不成熟,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应该产生在东汉末年。

在两派相争的情况下,为什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否定派的说法却最终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呢?我以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派学者除了实证的搜罗之外,还相信进化的理论和综合考察的方法,他们不是孤立地就枚乘诗、苏李诗等展开讨论,而是结合整个汉代五言诗发展的历史、《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综合考察。这其中最关键处有三点:第一、从现存的汉代全部五言诗来看,西汉时期除了乐府和歌谣中有一些五言诗之外,现存的可以认定是西汉时代的文人五言诗不仅数量很少、水平不高,而且作者值得怀疑。第二、现存的比较可靠的较早的东汉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可是这首诗尚且“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五言诗到此时尚不成熟。第三、从《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内容来看,

它们只能产生在“将乱未乱”之时的东汉后期。应该说,这种综合性的考察是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的。

我们很赞同这种综合考察的方法,特别是像文人五言诗起源问题的研究,在历史文献记载不足的情况下尤其重要。通过这种综合考察,我们也认为,六朝时期关于“枚乘诗”、“苏李诗”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在西汉时期产生这样诗篇的可能性不大。虽然黄侃、古直、隋树森等人反驳了自苏轼到梁启超等,提出了诸多疑问,证明枚乘、苏武、李陵时期有文人写作五言诗的可能,但是他们同样提不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可能性。例如,黄侃等人据《明月皎夜光》、《东城高且长》、《凛凛岁云暮》三诗中所描写的节令,进一步证明李善之说,认为这些诗歌当作于汉武帝太初改历之前。但是逯钦立却认为这些诗也有作于王莽改历之时的可能,^{②7}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则根据《史记·天官书》,认为“玉衡指孟冬”不是指季节月份,而是指斗星所指时刻,此诗所写正是秋季七八月之交。^{②8}可见,这种对诗句的理解本来就有歧义,若没有其它辅证,并不能仅仅据此而肯定这几首诗一定作于太初之前。因此,综合性的考察无疑是我们弄清这些文人五言古诗产生年代的最好方法。

然而,梁启超用这种综合考察的方法,断定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产生于东汉末年^{②9},真的可以成为定论了吗?我们以为还不尽然。因为梁启超等人在进行综合考察的时候,对有些问题的考虑还不周全。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没有更为深入地考虑文人五言诗与乐府五言诗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对班固的《咏史诗》的理解有误;第三、没有更深入地思考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三点,不仅仅关系到我们对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断代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本质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就这几个问题分别展开讨论。

三、从五言诗与汉乐府的关系看文人五言诗的起源

考察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考察其与乐府的关系。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提出“五言诗出于西汉民间乐府不始于班固”,^{③0}在此书中他虽然主要论述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发展而兼及五言,并没有就汉代文人五言诗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但是他把五言诗的起源发展与乐府诗的发展联系起来的做法非常重要。其实,文人五言诗与乐府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这些诗是否可以歌唱的问题。中国早期的诗歌本来都是可以歌唱的,到汉代还是如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列有《诗赋略》,“诗”与“赋”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就是看它们是否可以歌唱,所以班固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而他把其它可以歌唱的诗就称之为“歌诗”。像五言诗这样的新诗体,在汉代基本上都是可以歌唱的。正如